

社區發展，只問怎麼作法，不問作些什麼

——論如何突破十年來臺灣社區發展的瓶頸

徐震

壹、前言

我國自民國五十八年起在臺灣地區推行社區發展工作，迄今已逾十年。十餘年來，此項工作備受社區民衆的歡迎與社會人士的重視，但也獲得不少批評。據臺灣省政府歷年有關社區發展的考核報告及其他有關臺灣地區社區發展的研究文獻顯示，其受到批評最多者首推「社區建設成果之不能維護」。許多人認為一個社區如果在推行社區發展工作三、五年以後，既不能繼續其發展，又不能維持其成果，則所有以往的發展工作，豈非前功盡棄？民國六十四年八月黃大洲教授於所提「臺灣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估研究」的報告中指出：「在一般民衆心目中都把社區發展和有形的環境衛生和交通改善聯在一起，對於社區發展中所包括的社會與政治的涵意尚無法體會」（註一）。民國六十八年三月李增祿教授在所提「臺灣地區居民參與社區發展的實證研究」一文中指出「社區發展工作人員之介入對居民參與方面並無明顯之成效」（註二）。同年七月李亦園教授在中國論壇第八卷第八期中批評臺灣有些鄉間的社區發展工作流於形式化：「凡事一經政府提倡，無論其工作性質是否適合於此一社區，大家都覺得要盡量配合……這種形式化的工作，與促進居民自動自發的精神不但有違背，而且久而久之將降低村民對其他工作的熱心」（註三）。以上這些評論，不論其所指為社區建設成果之維護問題或社區居民之參與問題或工作項目之是否能適合於社區的需要，要皆說明我們對於推行或從事社區發展的方法，有待研究。

筆者認為社區建設成果之不能維護是一種現象，而其所以不能維護者必有

其原因。同時，筆者認為社區發展是一種工作方式，一套工作方法，一種不同於使用行政命令，而在於發動民間力量，以自助的方式，去推動地方建設的一種方法。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如何突破近十年來這種社區發展中「不能維護成果」、「不能工作生根」的瓶頸，不在於研究「作些什麼」，而在於研究「怎麼作法」。以下讓我們從三方面來探討此一問題。

貳、認識社區發展的眞諦

「社區發展」這個名詞，究竟代表什麼意思，我們可以從下列四種文獻中找出其眞正的意義。

一、聯合國文獻——聯合國經社理事會於一九五六年的報告中提出：「社區發展一詞，業經國際通用，指一種過程。即由人民以自己的努力，與政府當局聯合一致，去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把社區與整個國家的生活合為一體，俾其對國家的進步克盡其最大的貢獻。此一複合的過程包括兩種基本要素：即由人民自己的參與，並儘可能靠自己創造以努力改善其生活水準；由政府以技術或其他服務以促進其發揮更有效的自助、自發與互助。此一過程可以在各種為促成社區多方面進步而設計的工作項目中表達之。」（註四）

二、美國政府文獻——美國國際合作開發總署於一九五六年之刊物中提出：「社區發展是一種社會行動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此一社區的人民首先要自己組織起來，找出他們的共同需要與問題，擬定他們的共同計畫，以迎合其需要與解決其問題，在採行此一計畫，盡量運用當地社區的資源。必要時，由政府或其他社團協助之。」（註五）

三、英國官方文件——英國一九五七年在社區發展研究會議的工作手冊中提出：「社區發展是用以促進全社區改善的一種運動。此種運動應由人民積極參與，如屬可能，應盡量由社區自動自發的推行。但如果此種精神未能自動地興起，則應用工作技巧以喚起之。並鼓勵居民熱烈地響應此一運動。」（註六）

四、我國政府文獻——我國行政院於民國五十七年五月令頒「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其第一章第一條載明：「社區發展為有計劃的動員區域內之人力、物力、財力，配合政府各部門的施政計劃與財力支援，以增進區內人民生活條件，提高區內人民生產效能，改善區內人民生活環境，建設民生主義的新社會為目標。」（註七）。

以上四項文獻，均認為社區發展是一種工作過程，一種工作方式或一種社會革新與建設的運動。同時以上四項定義，均不限定社區發展應從事某一種工作或某幾項工作。英國自社區睦鄰運動（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開始以來，即以「沒有既定的工作計劃，隨時視居民實際的需要而工作」為其特徵（註八）。由此可見，社區發展並不指某一次或某些項工作內容，只是一種組織民衆，教育民衆，以合力建設地方社區的工作方法，而此種工作方法，可以在任何一種促進社區進步的工作項目中表達之。

參、強調社區發展的作法

從以上「社區發展」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社區發展是一種工作過程或方式。我們所從事的許多地方建設工作，很可能都有助於一個「社區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但這些工作是不是就是我們所說的「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呢？其衡量的尺度不在於工作的內容或項目，而在於工作的作法與方式。茲舉例說明如下：

一、以社區修路為例

在修築社區道路的過程中，我們常見的有兩種不同的工作方式：

（一）由工程人員主辦——工程專家對於社區修路或一般修路所考慮的工作重

點，常着重於對路面長寬的測定、沙石水泥人工等的計算。當工程人員完成他們的工作計劃以後，即交由政府主辦單位承辦或由主辦單位發包交由工程公司辦理。而地方其他團體或民間人士很少有機會參與此一工作。雖然，此種修路的工作同樣地有益於社區的建設，但其本身却只是一項「工程工作」，並不涉及於「社區工作」的層面。

（二）由社工人員主辦——社工人員對於社區修路所考慮的工作重點，不在於「物質層級」的一面，而在於「社會關係」的一面。因此，他常常：

1. 先向居民探求此一道路對於社區居民的共同需要性。
2. 再於社區會議中提供居民或其代表的一個充分討論或表示其共同願望的機會。

3. 藉此機會，以促進社區居民的合作態度和民主的工作程序。

4. 藉此機會，用分工分組，出錢出力的方法，把社區組織起來。

5. 儘量從社區中尋求工程專業人士主持此一工程設計工作或以志願工作人員，協助此一施工計劃。

6. 必要時，再請政府單位給予工程技術及財力上的協助。

7. 儘量尋求社區內外各機關團體的參與、討論與合作。

8. 在修路完成後，由社區理事會出面舉辦落成典禮，以示慶祝。藉以增加社區居民的榮譽感與自信心。期能從建立「此路是我們大家所修」的自信心與責任心，進而推動社區其他的發展計劃或自助事項。

比較以上兩種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們可以看出：第一種是一項「物質建設」，是一種用「人力」所修成的路；第二種是一項「社會建設」，是一種用「人心」所修成的路。雖然這一條路同樣的可以帶給社區以交通上的便利和經濟上的繁榮，但它對於居民的養成參與社區事務的習慣與同心協力的精神，以及今後對於此一工程維護的心理，則可能有不同的效用。

二、以古代倉儲為例

我國古代的倉儲制度有三：

（一）常平倉——是政府常設的糧倉機構，用以調劑物價及救助災荒的官倉。

（二）義倉——是由富者捐助糧食，以補官倉之不足，而合於分貧濟富的義舉

(三) 社倉——是由地方居民自行設立，自行管理的社區互助組織。

如果我們以現代社區發展的定義與作法，去衡量我們古代的這些倉儲制度，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一)常平倉只是一種政府的糧政措施，(二)義倉只是一種濟貧的慈善事業，這些雖然都可以有助於社會，但却與「社區發展」的基本概念無關。只有社倉，我們認為它是一種相當良好的「社區發展」工作，因為社倉在其工作的過程中(註九)，合於——

1. 「自助組織」的作法。
2. 「自我教育」的作法。
3. 「居民參與」的作法。
4. 「官民合作」的作法。
5. 「經社並重」的作法。

雖然這三種「倉儲」制度，同是一種有關「糧食」與「救助災荒」的措施，同樣有助於社區福利與社會安定，但由於其工作方式的的不同，我們認為只有「社倉」一項，才合於「社區發展」中「組織」、「教育」、「自助」、「自治」的基本精神。

三、以媽媽教室為例

臺灣地區現行的「媽媽教室」工作，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作法(註十)：(一)由國民小學主辦——有些媽媽教室係由國民小學主辦，而他們的作法多著重於如下的措施：

1. 媽媽教室的成員即學校學生的家長，多由其母親與姊姊等所組成。
2. 在教室的課程安排中，著重於親戚教育與兒童心理的解說。
3. 加添插花、烹飪、美容、土風舞等課程，以增加媽媽們參加的興趣。

(二)由社區理事會主辦——有些媽媽教室係由社區理事會主辦或由社區理事會與國民小學或其他地方機構合辦，由於這些單位對於社區工作觀念的不同，其作法乃與前項由國小單獨辦理者有異。

1. 這些媽媽教室的成員以全社區的婦女為對象，而不限於某一學校學生的家長。
2. 所有課程與活動的安排，均以增進社區鄰里互助的關係為重點，而不限

於學校與家庭的關係或對於兒童的教育。

3. 透過烹飪、美容、插花、土風舞等活動，以增加婦女參加的興趣，但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活動，以發掘婦女中熱心社區公益的領導人才，希望從他們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及討論，進而有助於社區其他自助計劃的推行。

雖然以上兩種媽媽教室都有助於地方婦女的參與及學習，但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一)前者是「學校的」媽媽教室，以一個單位(學校)的關係為局限，是一種學校教育的推廣，其有助於「學校與家庭」的關係，自不待言；但其是否能促進全社區的社會關係，則並未顧及。(二)後者是「社區的」媽媽教室，其主要的目的與功能在於增進全社區的社會互助與合作關係。以上兩者雖然都是媽媽教室，但由於兩者工作方法的不同，其可能預期的成效自然也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他如一個營業性土風舞訓練班中所舉辦的舞蹈訓練與一個社區理事會所舉辦的土風舞活動；一個由體育專家所提倡太極拳運動與一個由社工人員所組成的社區太極拳研究會都有着顯然不同的作法與方向。而後者用以增進社區人羣關係與合作態度的方法，便是社區發展工作的最大特徵。

以上各種舉例係說明社區發展是一種不同於行政命令，不同於慈善事業，不同於以一個單位為範圍的活動，而側重於組織民衆與教育民衆，以培養社區自助精神與自治能力，從而有助於社區中各種建設的工作方法。

肆、提高社區發展的境界

基於以上所述，我們可以進一步談到社區發展的幾種工作階段或工作模式。

美國社區工作專家饒斯曼(Jack Rothman)將社區組織工作區分為三種模式：(一)地方性的發展(Locality Development)，(二)計劃性的發展(Social planning)，(三)行動性的發展(Social action)(註十一)，克羅斯廷森(James A. Christenson)將社區發展工作區分為三種主題：(一)技術協助方式(The Technical Assistance Approach)，(二)社區自助式(The Self-help ap-

proach) (社區競爭式 (The Conflict approach) (註十一))。他們二人的說法有些相似，前者所稱的行動性的發展亦即後者所稱的社區競爭。但前者所稱的地方性的發展，實際上即聯合國所推動的社區發展工作。筆者對於他們所談的第三種模式或作法不甚同意，而認為社區發展工作主要作法，在於將一個社區由某一發展階段推進到另一發展階段，亦即提高社區中發展的境界。因此，筆者主張：一個社區，其發展工作的境界或社工人員對於社區的輔導工作，均可劃分為三個階段與三項重點。

一、協助階段

此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在「協助」。即由政府協助社區理事會加強生產、福利、衛生等服務及舉辦教育、文化、康樂等活動，以引導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

二、自助階段

此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在「自助」。即由政府輔導社區理事會擴大社區組織及訓練社區志願工作人員，以充實社區理事會自助自治的能力。

三、互助階段

此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在「互助」。即由政府鼓勵各鄉鎮，聯合各鄰近的小社區，共同策劃並設立社區服務中心，任用專業工作人員，以辦理各社區的共同事務。

在以上三個階段或三種發展的境界中，其工作內容雖可能因時因地而各有不同，但其工作的基本方面則均應着重於組織與教育活動，以期將一個社區的發展：

1. 由「被動」帶入「自動」
 2. 由「他助」帶入「自助」
 3. 由居民們的「旁觀」帶入「參與」
 4. 由機構間的「衝突」帶入「合作」
 5. 由「權威決策」帶入「民主決策」
 6. 由「一元領導」帶入「多元調和」
- 這種將一個社區由一個階段帶入另一個階段，將一種發展由一個境界帶到

另一個境界，全靠社工人員的作法與政府推動的方針。在此時刻，在我們已有了一十年的社區發展工作經驗之後，如果我們仍然替社區居民代訂工作項目而不去改進工作方法，欲求發展「升級」或工作「生根」，那不是「緣木求魚」嗎？

伍、結 論

本省於民國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之間，即在臺北縣、桃園縣、及宜蘭縣先後推行基層民生建設工作，於民國五十七年改稱社區發展，同時劃歸社政單位主管（註十三）。在推行基層民生建設工作的階段，臺灣省基層民生建設輔導委員會曾將基層民生建設的方法歸納為左列十項（註十四）：

一、民生建設是人民自己的事，必須發動民衆自己作，不可代作，亦不可跑在民衆前頭，要耐心地說服民衆，帶領民衆一同前進。

二、一切建設必須適合當地社會之需要，第一個計劃必須基於當地民衆多數之請求而辦理。

三、建設之始必須先有若干物質之成就以吸引當地人民堅定其向心力，並儘量誘導他們自己去努力，使他們知道自己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四、建設計劃應注意多目標之發展，以便引發相關事業之進步。

五、鼓勵人民自己參加各項建設之設計，並由民主的選舉產生他們自己的領袖，從工作經驗中培養良好的公民。

六、培植地方領袖，來推動各項工作並派遣專家，舉辦訓練，使民衆均能運用現代科學方法，來改善自己生活，增加生產收入。

七、青年婦女為社會骨幹，必須充分予以信賴，所謂「生活標準即是家庭標準」，家庭標準之提高必須得到主婦之協力，以社會作青年婦女之學校，教以現代知識，更予以實踐之機會。

八、人民的自動與政府的援助同等重要，每一地區之發展都需要外來的鼓勵與技術的援助。尤其新計劃之實施，人員之訓練，必須資財之供應，光靠本身力量無法成功，但如祇有援助而無人民自動的努力，同樣亦必失敗。

九、在建設區域內，民間的組織，政府的機構，以及其他各種團體，均應充分加以利用，團結合作建設地方。

十、民生建設是關係全國人民生活的事，實驗有成效，必須全面推廣，故應有全面性的計劃，並成立輔導研究機構，以謀求工作之推動與改進。

以上我們自定的十項工作方法與聯合國推行社區發展的基本原則，頗多相似或相同之處。只是自該項工作改稱並劃歸政府主管以後，一方面由於地方人力財力的限制，一方面由於許多人仍習慣於傳統行政中「下道命令」或「統一規定」的作法，致使此項工作並未能按照專業的或既定的工作方法去實施。因此，我們可以從許多社區工作的過程中認出至少有一部分措施不是社區發展工作，而只是一項社區工程計劃或一種社會福利措施而已。明乎此，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許多社區不能維護其建設成果的根本原因了。

由於直到現在，尚有一部分工作人員對於社區發展仍執着於「如何規定工作項目」及「如何依照上級的規定行事」的心理狀態，本文特引述各種文獻，試圖證實：

一、社區發展並非意指某一項或某幾項工作項目，而係指一種社會行動或從事社會建設的工作方法。

二、雖然同樣是一種工作，同樣有益於社區居民，但由於其工作方法不合於社區發展的要求，自難以達到其發展社區的希望。

三、由於社區發展的過程不同於一般行政的工作程序，故社區工作人員必須深入基層，與社區居民一同生活，一同思考，一同討論，從而引導社區居民從「他助」進入「自助」的發展境界。

總之，筆者認為社區發展是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一種推動基層民生與民主同時建設的工作方法。故政府推動此一工作，必須突破傳統的工作方式，改用由下而上的組織方法。其一切措施，不僅在於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尤在於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不僅在於增進社區居民的福利，尤在於引發社區自治的潛力。謝副總統東閣先生在臺灣省主席任內曾對於社會工作引用「送給居民一條魚，不如教居民學釣魚」的名言。這便是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基本原則，更是「增進社區居民自治能力」與「維護社區建設成果」的根本方法。

附註

- 註一：黃大洲，臺灣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估研究，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油印本，民國六十四年八月，第七十五頁。
- 註二：李增祿，臺灣地區居民參與社區發展之實證研究，臺大社會學系「社區兒童、青少年、老人社會工作研討會」，民國六十八年三月，第十一頁。
- 註三：李亦園，評社區發展一文，中國論壇第八卷第八期。
- 註四：U.N. Economic & Social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24th Session, annexes, Agenda Item 4: 20th Report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n Coordination to the Council, Annex III P.14, 1956.
- 註五：Louis Minichler, "C.D. Defined" in The C.D. Review of I.C.A. No.3 Dec, 1956.
- 註六："C.D.", Handbook Prepared by a Study Conference on C.D. held at Hartwell House Aylesbury, Bucks, Sept. 1957.
- 註七：行政院，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民國五十七年五月臺五十七內三七一〇號令頒。
- 註八：葉楚生，社會工作概論，民國五十二年版第四十六頁。
- 註九：詳見徐震，社區與社區發展，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出版，第三四四頁至三四七頁。
- 註十：關於「媽媽教室」的推行工作方式，係民國六十九年底至七十年初在省訓團社會工作人員各期研討會中，由許多縣市之社會工作人員提出之討論，其間各縣市的工作方法不一，自不能一概而論。本文所舉例證，只不過其中不同的方式之一、二而已。
- 註十一：Jack Rohman, "Three Models of C.O. Practice," in Fred M. Cox, et al., (eds) Strategies of C.O. (Iasca, Ill., F.E. Peacock, 1970) pp.20-36.
- 註十二：James A. Christenson, "Three Themes of C.D." in J.A. Christenson & J.W. Robinson, Jr., (eds), C.D. in America, (Ames, Iowa: The Iowa State Univ. press, 1980) pp.38-48.
- 註十三：徐震，「我國的社區發展工作」，見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主編，「邁向均富安和樂利社會的途徑」一書，（國立編譯館印行，民國七十年元月），第一四六頁。
- 註十四：同上文，第一四二頁至一四四頁。

非
行

少
年

的
家

庭
觀

廖榮利

壹、從少年在家庭中的社會化談起

自從人類想使自己文明化而設定一些行為的社會規範開始，就產生了少年行為的現象與概念。根據文獻記載，大約在六千年前，一位埃及的牧師曾在石頭上刻有：「我們的大地在變質墜落……，孩子們不再絕對服從他們父母的話了。」又在約三百年前，一位英國的大教育家約翰洛克 (John Locke) 也曾對少年行為有與上段類似的悲嘆之詞 (Johnson, A.M. 1965)。足見，少年非行為是人類社會很早就已存在的現象，只是隨着社會的變遷，少年非行為的嚴重性，研究取向，以及對非行少年的待遇有改變或進步的事實 (廖榮利，

1978a)。

少年非行為 (delinquent behavior) 可視為一個少年社會化失敗所顯示的行為表現，而形成這種行為較顯著的因素，乃因他曾經生活在一個高度缺乏關愛的世界裏，人際關係帶給他的往往是痛苦失敗的感受與經驗。因此，他體驗到的生活若不是報償即是懲罰，並且，他未曾或極少致力於與旁人深層關係的建立與維持。因而造成他對滿足個人內在慾望之延緩能力薄弱；同時，往往允許自己過分表達他的憤怒和卑劣行為於過去曾拒絕或冷落過他的人（或類似人物）身上。(McNeil, 1969) 從社會化的觀點來探究少年非行為，也許比較能夠為防治工作刻劃出具體可行的方案。

失敗的社會化經驗，最主要的發生於家庭生活裏，其中與負有教養子女職責的父母之關係尤為密切。對於非行少年家庭生活的一些研究發現，他們往往生長於一種社會文化墮落社區中的破爛、擁擠，以及貧困的家庭中；不僅物質與生理上過着貧乏和冷酷的情況，並且家庭與同儕的人際關係也是疏離與充斥不滿和敵意為多。尤其，這些非行少年和他們父母之間的關係是欠健全的，在成年父母的拒絕態度，矛盾衝突的心理，以及情緒困擾的壓力之下，非行少年對人生首次與成人（或權威形象）的關係之體驗，形成他們不但缺乏順服權威與規範的意願，並且或由過分渴求關愛，或由於表示不滿與憤怒而反抗權威。

貳、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主題

本研究係以家庭價值、家庭功能、家庭溝通、媒介使用，以及助人關係為主題，探究臺北市籍非行少年與一般正常少年對家庭的價值、功能、溝通、媒介使用，以及對助人關係等之看法，在其基本資料上關係之比較分析，並發現這些因素在提供或接受專業服務時之互動情形，期能提出臺北市少年輔導近程、中程，以及遠程的工作計劃中，對家庭的服務內容與方式方面擬定具體之建

議事項，以發揮少年輔導之功能。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青少年中又分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兩個不同的團體。非行少年以臺北市的虞犯與已具犯罪事實之青少年為對象。這些青少年依其非行不同事實與程度，目前分別在少年監獄、少年輔育院、少年觀護所、少年法庭、少年隊，以及幼獅育樂營接受不同的感化或輔導教育。本研究所選定的對象係由上述各機關填送的名冊中，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定受試者。正常組的青少年則以臺北市某國民中學三年級的學生為主。其中又以該校現行分班辦法中之學習「成就高」的班與「成就低」的班，挑選男女性別的優良與不良者各兩班。研究人欲了解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對家庭價值、家庭功能、家庭溝通、媒介使用，以及專業服務等方面之看法，以及與個人基本資料的相關與差異性。

三、問卷設計

研究係以問卷訪問調查為主，以參與觀察為輔。青少年的問卷當中，內容包括其個人基本資料，諸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區環境、家庭結構、出生序等，在家庭中父母的管教態度，對家庭價值、家庭功能，以及家庭溝通之看法，與大眾媒介的接觸時間與偏好等。父母的管教態度將用七等級。從「非常開明」到「非常專斷」，從「非常嚴格」到「非常溫和」等七個層次。家庭價值和家庭功能方面，採五等分量表，受試者依其同意程度，在「很不同意」、「不同意」、「沒有意見」、「同意」、「很同意」當中，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而家庭溝通部分中社會取向與觀念取向各列十項，依頻率而分「從不」、「偶而」、「有時」、「經常」，以及「總是」五種程度，由受試者擇一而答之。至於媒介使用時間偏好，則以接觸報紙、電視、廣播、雜誌、書籍，以及電影的時間長短與頻數為主。媒介偏好則要求受試者在各

種不同種類的節目與內容當中，選擇其最喜歡的項目來作答。

四、統計方法

本研究的統計方法，除了運用描述性統計中的一些基本方法，以求得受試者對各項問卷回答的分佈百分比之外，另外視研究資料的不同性質，分別運用凱氏平方考驗 (χ^2)，與T值檢定 (t) 方式來求取變項之間的差別；運用相關法的知曉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係；史比爾門層次相關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來求得比輕重的差別與相關；以及利用數量統計中簡單變異數分析以求取不同團體中不同背景受試者對某些變項的差別程度及其意義。

本研究所有資料均由電腦統計分析，電腦作業係利用美商 (Gpa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 為之。

五、研究問題與預期發現項目

1. 青少年背景資料的分佈型態如何？
2. 青少年對家庭的價值與功能抱持何種看法？
3. 青少年對家庭溝通的看法如何？
4. 青少年使用媒介的時間與偏好如何？
5. 青少年在家與父母溝通的型態如何？正常組青少年與非行組青少年就家庭內與父母的溝通型態而言有何區別？
6. 青少年背景資料的不同是否影響其對家庭溝通內社會取向、觀念取向看法不同？不同背景、不同團體的青少年家庭價值的看法有何不同？媒介使用時間的長短是否因個人背景差異而在不同團體中顯出區別來？
7. 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家庭內社會取向、觀念取向、家庭價值的看法以及媒介使用時間，依輕重、長短的分佈如何？
8. 青少年們在家庭溝通型態的不同與個人背景有何關聯？同屬一型家庭溝通型態的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其個人基本資料有何差異？

9. 正常少年在校表現優良與不良者，其個人背景資料有何差異？

叁、受試少年的背景資料分佈情形

性別與年齡：在回答問卷的所有少年當中，男性兩百三十八名，佔百分之七二·五，其餘為女性。非行少年組全為男性，而女性則來自比較組的某國中學習成就高班和低班的學生。在年齡的分佈上，以十五歲的最多，佔百分之三十九·一，次為十六歲，佔百分之二十六·三，其分佈情形如下表：

表一 受試少年年齡分佈表

年齡	總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2歲			1	0.3
13			6	1.8
14			26	8.0
15			128	39.1
16			86	26.3
17			44	13.5
18			21	6.4
19			9	2.8
20			2	0.6
20以上			4	1.2

教育程度、籍貫、生長環境與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方面，百分之六十七·九來自同國中三年級的學生。籍貫方面，本省籍者居多，佔百分之五十七·二；外省籍者佔百分之十四·六。生長的环境以市內為最多，佔百分之七十六·一；次為市郊，佔百分之十五。在宗教信仰方面，以信仰佛教者最多，佔百分之五十九·三；其次就是無神論者，佔百分之二十二·六。

家中的子女數、排行、收入與居住環境：家中子女數，以四個與三個者最多，各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其次是五個。在家的排行，受試少年當中，有百分之四十一·三居中；百分之二十九·七為么子女；而百分之二十七·二為長子女。受試的青少年當中，有百分之四十三·一的家庭其收入在八千到一萬五

之間；其次百分之二十四·五的少年其家庭收入在四千到八千之間。在住宅環境當中，百分之七十三·一的少年居住在普通住宅區，其餘則居住在不同的住宅區。

家庭結構、父母婚姻狀態、與家中重要事情的決定權：家庭結構方面，小家庭最多，佔百分之八十·四，其次是折衷家庭，再次則是大家庭。

住在家中、父母婚姻狀況與家中重要事情的決定權：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少年是住在家中，其他近百分之十的青少年租房住或借宿親友家。至於父母目前的婚姻狀態，百分之八二·六的青少年父母健在；百分之十一的青少年父母有一方死亡。有百分之六十五·一的受試少年認為其家中重要事情是由父親來做主；百分之二十六·三是由母親做主；其他則由家中不同親屬來作主。

父母在家中的作風：各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少年認為其父親在家非常開

表二 父母作風層次表

在家中作風層次	父		母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開明	82	25.1	68	20.8
相當開明	84	25.7	90	27.5
有點開明	55	16.8	63	19.3
沒有意見	25	7.6	20	6.1
有點專斷	40	12.2	34	10.4
相當專斷	9	2.8	10	3.1
非常專斷	1	0.3	3	0.9

表三 父母親管教態度層次表

管教態度層次	父		母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嚴格	38	11.6	20	6.1
相當嚴格	45	13.8	34	10.4
有點嚴格	87	26.6	74	22.6
沒有意見	20	6.1	17	5.2
有點溫和	49	15.0	62	19.0
相當溫和	36	11.0	63	19.3
非常溫和	15	4.6	15	4.6

明與相當開明；百分之十六·八的受試者認為其父親作風有點專斷。而母親方面就略有不同，百分之二十七·五的青少年認為其母親作風非常開明，其分佈如表二（請見上頁）。

父母的管教態度：在父母的管教態度方面，有百分之二十六·六的受試少年，認為其父親在家管教子女有點嚴厲，而其次就是有點溫和。母親方面，則有百分之二十二·六的青少年認為其母親的管教態度有點嚴格，其次各有百分之十九左右的受試者認為其母親在家管教有點溫和或相當溫和。其分佈如表三。家中最了解和最親近少年者：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受試者認為在家庭母親最了解他（她），其次就是父親，佔百分之十七·一，姊姊居三，佔百分之十四·一。有百分之三十二·四的受試少年認為和母親最親近，其次就是姊姊、哥哥、父親與弟弟。

肆、受試少年的背景資料對家庭價值， 家庭功能，家庭溝通，以及媒介使 用之影響

由簡單相關來看一些基本變項與青少年在家庭價值觀，家庭內與父母溝通時是社會取向重抑或觀念取向重，以及媒介使用情形等的強弱等關係時，研究者的發現如下（表四）表所示。

由表四可知，受試少年的年齡與社會取向或觀念取向，以及媒介使用長短都有相關。但是，社會取向和媒介使用長短是正相關，而觀念取向與年齡是負相關。這表示少年年齡愈大，其具社會取向的觀念愈重；而相反地，年紀愈大，觀念取向愈弱，同時，年紀愈大，接觸媒介的時間就愈長。教育程度，家庭價值；社會取向或觀念取向，以及媒介使用都沒有明顯的相關。

家中子女人數與子女在家裏的溝通型態沒有明顯的相關，但與媒介使用的長短却有正相關，表示子女人數愈多，一個青少年在家使用媒介的時間愈長。家中子女數與個人對家庭價值的看法是偏向家庭取向或個人取向沒有明顯相關。

表四 受試少年背景資料與家庭價值等的相關表

變項 基本變項	社會取向	觀念取向	媒介使用	家庭價值
年齡	0.1040*	-0.1130*	0.2807***	0.0822
教育程度	0.0383	0.0133	-0.0542	-0.0614
子女數	0.0466	-0.0511	0.1192*	0.0185
收入	-0.0424	0.2103***	-0.1048*	-0.1709**
父親作風	-0.1122*	-0.1936***	0.0499	-0.1340*
母親作風	-0.0844	-0.1457**	-0.0509	-0.1592**
父親管教	-0.1538**	0.1112*	-0.0244	-0.0384
母親管教	-0.1214*	-0.0145	0.0077	-0.0330

看出，在家庭和母親最親近的花較少時間接觸媒介，而和父親最親近者花最多時間接觸媒介，但差別並不明顯。(註)家庭收入高的青少年與其父母有較具強烈觀念取向的溝通型態，媒介使用的時間却較短。相反地，收入較低家庭中的青少年花較長的時間來使用媒介。收入較高家庭的子女家庭價值觀較弱；而收入較低家庭中青少年較具強烈的家庭價值觀。

家中父親作風與家庭溝通中社會取向，觀念取向有明顯的負相關，而與家庭價值觀也具負的相關。也即是說：父親作風愈專斷者，其社會取向、觀念取向愈弱，而父親作風愈開明者，其自覺家中與父母溝通時社會取向、觀念取

收入與社會取向的溝通型態沒有明顯的相關，但與觀念取向有正相關，與媒介使用長短與家庭價值觀的強弱有明顯的負相關。也即是說最了解自己的並不影響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的使用長短($F=1.03$ ，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覺得母親較瞭解自己的花較少時間接觸媒介，但差別極不明顯。(註)

在家庭中最親近也明顯造成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使用時間長短的差別($F=1.421$ ， $P>0.05$)，由平均值可

向愈強烈而明顯。父親作風愈專斷者，其家庭價值觀念愈淡薄，而父親作風愈開明，其家庭價值觀念愈強。

母親作風與家中的觀念取向與家庭價值有明顯的負相關，也即是說，母親作風愈專斷者，其子女愈感覺其家中溝通是缺乏觀念取向的，同時對家庭價值的看法也愈淡薄。

父親的管教態度與其子女感覺家中溝通型態是社會取向抑或觀念取向有明顯相關，父親在家管教愈溫和者，其子女愈較不覺家中溝通是具強烈的社會取向觀，反而較覺得家中是較強的觀念取向的溝通型態。父親的管教態度與媒介使用長短與家庭價值強弱沒有明顯的相關。

母親的管教態度與子女感覺家中溝通型態是社會取向者有明顯的負相關，亦即說，母親管教愈溫和者，其子女愈不覺父母灌輸其過多的社會取向的言詞與觀念。但母親的管教態度與子女的觀念取向，媒介使用長短與家庭價值觀之強弱沒有明顯相關。

伍、非行少年背景資料與家庭價值、家庭溝通、媒介使用相關之分析

一、家庭價值方面：

性別與籍貫：性別不同的青少年因團體的差異，對家庭價值的看法自然也有差異，這種差異可由統計看出，男性對家庭價值的看法較女性強。但籍貫不同並未造成不同團體內青少年明顯的差異 ($F=1.0614,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外省籍的孩子對家庭價值看法較強，而本省籍青少年次之，客家籍青少年最次。

生長環境與家中排行：生長環境也無顯著影響不同團體的青少年 ($F=0.8313,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生長市內的青少年其對家庭價值的看法高於生長在市郊與鄉鎮者，但差別極不明顯。家中排行也不因不同團體而造成

青少年明顯的差異 ($F=1.2038,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老么對家庭價值的看法較強，而老大及居中者次之，但差別也極不明顯。

家庭收入與居住環境：收入因不同團體的青少年而造成極大的差異 ($F=4.2331, P<0.01$)。由平均值可看出，收入在一萬五千到二萬五千的青少年家庭，其子女最不具有強烈的家庭價值觀，但收入在四千到八千的青少年家庭，其子女最具強烈的家庭價值觀。住家環境不因團體的不同而造成極大的差異 ($F=1.6163,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居住在軍眷村的青少年，其對家庭價值的看法最強，而居住在高級住宅區的青少年，其家庭價值觀最淡。

家庭結構與父母婚姻狀態：家庭結構不因不同團體的青少年而造成明顯的差異 ($F=0.3634,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大家庭生長的青少年較具強烈的家庭價值觀念，而生長在折衷及小家庭內的青少年比較上就不具這種強烈的家庭價值觀念。父母目前狀況不因青少年組別的不同而造成明顯的差異 ($F=0.9056,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父母離婚的青少年對家庭價值的看法最強烈，而對家庭價值看法最強烈的二組是父母分居，其次為父母有一方死亡者。

家中主要事情的決定權與最瞭解和最親近的人？家中事是由父親或由母親做主，造成不同團體間明顯的差異 ($F=3.8757,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家中由父親作主的，其子女家庭價值觀較強，但家中事由母親作主的，家庭價值觀較淡。在家中是父親或母親或其他親屬最瞭解自己的亦因團體的不同而造成極明顯的差異 ($F=8.0929, P<0.001$)。由平均值可看出，家中覺得父親最了解自己的，家庭價值觀重。由母親做主的次之，而覺得其他兄弟姊妹或親屬最了解自己的，家庭價值的觀念較淡。在家庭和父親或母親或其他兄弟姊妹等多親近的，也因團體的不同而造成明顯的差異。家中覺得和父親、母親最親近者家庭價值觀念較強，而和兄弟姊妹或其他親屬較親近者，家庭價值觀較淡。

二、家庭溝通方面：

甲、社會取向方面：

對於不同團體中的青少年，其對家庭溝通內社會取向的看法各有不同，而

又因個人基本資料的差異而造成統計上的有意義或無意義。究竟個人不同的背景資料是如何影響不同團體的青少年呢？統計結果顯示如下：

性別與籍貫：性別並沒有造成不同團體對社會取向看法的明顯差異 ($F=0.8367, P>0.05$)。而由平均值看出，女性對社會取向看法較男性為重，而男性在社會取向的得分上低於女性。籍貫亦沒有影響不同團體內青少年社會取向的看法 ($F=0.0438, P>0.05$)。本省籍和外省籍與客家籍貫的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的家庭溝通看法幾乎一致。

生長環境與出生秩序：而生長的环境亦沒有明顯影響不同團體中青少年對家庭溝通中社會取向看法的差別 ($F=0.2968,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生長在市內與鄉鎮的青少年其對社會取向的看法高於市郊生長的青少年。但差別並不明顯。家中出生秩序沒有影響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家庭溝通中社會取向的看法的明顯差異 ($F=0.8794,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在家排行長子女或老么的，其對社會取向的看法高於居中的孩子。

家庭收入與居住環境：在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方面，除收入在一萬五到二萬五之間家庭的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的看法偏低以外，其他都沒什麼差異。不同團體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的看法則沒有明顯的不同 ($F=0.6017, P>0.05$)。由平均值可知，收入在一萬五到二萬五家庭的子女在社會取向上得分最低。住宅環境並沒有造成不同團體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看法的明顯差異 ($F=1.1325, P>0.05$)。不過，由平均值可看出，住公教住宅的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的看法最強，而住高級住宅與違章建築的青少年則在看法上較認為其與父母溝通取向中社會取向較低。

家庭結構與父母婚姻的狀況：家庭結構的大小也沒有造成不同團體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看法的明顯不同 ($F=1.0219,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小家庭中生長的青少年在社會取向的看法上較居住在大家庭與折衷家庭的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的看法淡薄些。父母目前的婚姻狀況沒有明顯影響不同團體中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的看法 ($F=0.1739, P>0.05$)，但是，由平均值可看出，父母皆亡的孩子對社會取向的看法最強，而父母分居的青少年對家庭溝通中社會取向的看法最淡，而其次就是父母離婚與父母有一方死亡者，其對家庭中社會取向的看

法也較弱。

家中主要事情的決定權與最了解和親近的人：家中是由父親作主或母親作主並不明顯影響不同組別青少年對社會取向的看法 ($F=0.6757, P>0.05$)，但是，由平均值可知家中事由父親作主的，社會取向的看法較強。在家覺得父親、母親或其他親屬或兄弟姊妹最了解自己的雖因不同團體而互異，但並不具統計上的意義 ($F=0.5292,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家中覺得除父親、母親之外的人最了解自己的，較不具強烈社會取向的看法的。在家和父親、母親或其他人感覺最親近的，不因團體的不同而造成明顯差別 ($F=1.4639,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在家覺得和母親最親近的，最具強烈社會取向的看法。

乙、觀念取向方面

性別與籍貫：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家庭溝通中觀念取向的看法不因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F=0.2056, P>0.05$)。由平均值可知，男女對觀念取向的看法幾乎相同。籍貫的差別亦沒有影響不同組別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看法的明顯差異 ($F=2.983,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外省籍的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的看法較強，本省籍次之，而客家籍的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的看法最淡。

生長環境與家中排行：生長的环境沒有明顯造成不同組別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看法的明顯差別 ($F=0.7019,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生長在市內的青少年其觀念取向較生長在市郊及鄉鎮者來得低些，但差距極不明顯。家中排行的差別並不影響不同組別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看法的明顯不同 ($F=1.0976, P>0.05$)。由平均值可知，老大對觀念取向的看法較居中及老么者來得強些。

家庭收入與居住環境：而家中的收入却明顯地影響了不同團體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看法的差異 ($F=4.369, P>0.01$)。由平均值可知，家庭收入愈高者，其對觀念取向的看法愈強，而家中收入較低者的青少年則對觀念取向的看法較淡薄。住宅環境沒有明顯影響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家庭溝通中觀念取向的強弱 ($F=0.3835,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居住在高級住宅及違章建築內的青少年，其家庭溝通中觀念取向較弱，而居住公教住宅與眷村的青少年，其觀念取向較強。

家庭結構與父母婚姻狀況：家庭結構沒有影響不同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看法

的差異 ($F=0.434$, $P>0.05$)。由平均值可知，小家庭的青少年觀念取向較大家庭及折衷家庭青少年對觀念取向的看法來得弱些。父母的目前婚姻狀況亦不因團體不同而造成對觀念取向看法的差異 ($F=0.5070$,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父母離婚的孩子在家庭溝通中觀念取向最強，而父母分居與父母有一方死亡者對觀念的取向最為淡薄。

家中主要事情的決定權與最了解和最親近的人：在家父親或母親做主不影響不同組別青少年觀念取向的強或弱 ($F=0.3325$, $P>0.05$)，在平均值上亦沒什麼差別。在家是父親或母親或其他人最了解自己不影響不同組別青少年對家庭中觀念的取向強或弱 ($F=2.038$,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家中父親做主的青少年其觀念取向較強，而母親做主的次之，家中兄弟姊妹或其他親屬做主的，觀念取向最為淡薄。在家與父親或母親或其他人最親近者，不因組別不同而對家庭溝通中觀念的取向造成差異 ($F=0.4688$,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與父親最親近者，觀念取向較強，而與母親或其他親屬最親近者，觀念取向較低。

三、媒介使用方面

性別與籍貫：在媒介使用的時間方面，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因團體的不同而造成明顯的差異 ($F=19.5289$, $P<0.001$)。由平均值可看出，男性較女性青少年花更多的時間接觸不同的媒介。籍貫沒有明顯地影響不同團體內青少年對媒介使用時間的長短 ($F=2.9522$, $P>0.05$)，但由平均值可看出，外省籍的青少年花最多時間在各種不同媒介上，本省籍的青少年次之，客家籍的青少年最次。

生長環境與家中排行：生長環境亦沒有明顯造成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使用時間的差別 ($F=0.8736$,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生長在市內的青少年使用媒介的時間最長，而生長在市郊者使用媒介時間最少，但差別極為輕微。家中排行明顯地影響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使用的時間 ($F=3.9659$,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長子花較少的時間。由平均值可看出，長子花較少的時間接觸媒介，但居中及老么則花較長的時間接觸媒介。

家中收入與居住環境：每月家中的收入並不明顯造成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

介使用時間長短的差異 ($F=2.226$,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收入在四千以內及在四千到八千之間的家庭，其子女花最多的時間來接觸媒介，但收入在四千到一萬五千，一萬五到二萬五的家庭，其子女花較少的時間來接觸媒介。住家的環境明顯地影響了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使用時間的長短 ($F=2.6442$,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生長在眷村的青少年花最多時間接觸媒介，居住違章建築的青少年次之，而居住公教住宅的青少年花最少的時間接觸媒介，其次就是居住在高級住宅內的青少年。

家庭結構與父母婚姻狀況：家庭結構並未造成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使用時間長短的明顯不同 ($F=0.3390$,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生長在大家庭的青少年花較多的時間接觸不同種類的媒介，但差別並不明顯。父母目前婚姻狀況造成不同團體對媒介使用時間長短的極大不同 ($F=3.956$, $P<0.01$)。由平均值可看出，父母離婚者子女花最多時間接觸媒介，而父母經常爭執的，其子女亦花相當長的時間接觸媒介，父母目前健在者，子女花最少時間接觸媒介。

家中主要事情的決定權與最瞭解和最親近的人：家中由父親或母親做主並不影響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的使用時間 ($F=0.6785$,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家中由父親做主的，花較長的時間接觸媒介，而由母親做主的，花較少的時間接觸媒介，但差別並不明顯。家中覺得父親或母親或其他兄弟姊妹最了解自己的並不影響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的使用長短 ($F=1.0344$,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覺得母親較了解自己的花較少時間接觸媒介，但差別極不明顯。在家和誰最親近也不明顯造成不同團體青少年對媒介使用時間長短的差別 ($F=1.4721$, $P>0.05$)。由平均值可看出，在家和母親最親近的花較少時間接觸媒介，而和父親最親近者最多時間接觸媒介，但差別並不明顯。

陸、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的比較

一、少年的背景資料方面之比較

性別與教育程度：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非行少年當中，男性佔百分之九六。

表五 少年對父母作風與管教態度看法之比較表

組別 統計項目 作風與管教態度	犯 罪 組			正 常 組			t-value
	\bar{x}	S.D	N	\bar{x}	S.D	N	
父 親 作 風	2.9836	1.872	122	2.7423	1.698	163	1.12
母 親 作 風	2.7857	1.695	112	2.7640	1.603	161	0.11
父 親 管 教 態 度	3.5328	2.094	122	3.9434	1.766	159	-1.74
母 親 管 教 態 度	4.2679	1.898	112	4.1338	1.687	157	0.551

三，而女性只佔百分之三·七；而在正常組當中，男女各佔百分之五一·五及四八·五，幾乎各半。在教育程度方面，非行少年以國三學生最多，佔三分之一，但由於隨意抽樣的結果，正常組的孩童完全來自國三三的學生。因此就性別及教育程度方面，即使兩組的差異在統計上顯著，亦不具任何意義。

籍貫、居住環境與宗教信仰：在非行少年與正常組其他個人資料的比較當中，可以發現孩童的省籍、居住的環境是鄉鎮或城市並未顯出明顯的差異。但是青少年的宗教信仰以及目前居住的住宅環境則在兩組當中顯出明顯的差別（ $\chi^2=28.045, P<0.001$ & $\chi^2=11.93228, P<0.05$ ）。

家庭大小、父母婚姻與家庭收入：家庭的大小、目前是否住在家裏這兩個因素沒有在非行少年與正常青少年的比較當中顯出差別。但父母目前是否健在或婚姻狀態則在兩組當中顯出極明顯的差異（ $\chi^2=20.77806, P<0.001$ ）。但就家庭收入而言，非行組與正常組就顯出明顯的差別（ $\chi^2=2.38, P<0.05$ ）。非行組的青少年來自的家庭收入低於正常組的青少年的家庭收入，因此顯示，非行組的青少年家庭的經濟狀況顯然低於正常組的家庭。

出生別、家中重要事情的決定權與最瞭解最親近的人：非行組與正常組的青少年就其出生序而言，並沒有

顯著差異（ $\chi^2=1.46, P>0.05$ ）。也即是說出生別並不會影響其是犯罪或正常。家中重要事情是由父親或母親或其他親人來作主，並沒有在兩組當中顯出差異。但是在非行少年這一組與正常青少年這組；認為誰最了解自己這子題當中，統計上顯出明顯差異（ $\chi^2=16.031, P<0.05$ ）。至於在家庭中和誰最親近，兩組並無顯著差異。

父母作風與管教態度：至於父母管教態度的嚴格與否及父母在家作風的開明與否，並不直接影響孩子的非行與否。本研究結果並不顯示非行組與正常組的青少年在認為父母家中作風與管教態度上的明顯差別，如下表

二、在家庭價值看法及媒介使用方面：

非行少年和正常少年除在個人背景與對家庭價值的看法上有些明顯的不同之外，在媒介的使用時間方面也有明顯的差別。所有媒介使用的時間都在非行少年組與正常少年組當中顯出明顯的不同。但除了非行少年比正常少年花較少時間來看報紙之外，其他有關看電視、聽收音機、看電影、閱讀報誌與閱讀書籍方面，非行少年都較正常少年花更多時間在媒介上。

表六 社會取向的溝通型態

觀念的溝通取向	低		高	
	放任式	保護式	多元式	共識式
低	放任式	保護式		
高	多元式	共識式		

表七 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家庭溝通型態看法之分佈表：

溝通型態 數與百分比 組別	放 任 式		多 元 式		保 護 式		共 識 式	
	N	%	N	%	N	%	N	%
非 行 組 (N=135)	37	27.4	26	19.2	31	22.9	41	30.3
正 常 組 (N=168)	48	28.5	41	24.4	27	16.0	52	30.9

三、溝通型態方面之比較：

依照理論架構，家庭溝通的型態可分為四種，即共識性的家庭溝通，保護式的家庭溝通，多元式的家庭溝通，放任式的家庭溝通四種。如表六（見上頁）。

根據青少年就問卷回答的方式而將其分配至一種家庭型態之內，非行組與正常組的青少年分配型態如表七（請見上頁）。

從以上的分佈型態看來，非行組與正常組的青少年自認其家庭溝通是偏向共識式的最多，各佔百分之三十·三與三十·九；其次則是放任式的溝通型態，各佔百分之二七·四與二八·五。因此，非行組與正常組在這方面是沒什麼差別的。但是，非行組的第三種家庭溝通型態是保護式，佔百分之二十二·九，而正常組的青少年選擇認為其家庭溝通型態偏向保護式的只佔百分之十六，是最少的一類。在正常組的青少年這部分，以多元式的家庭溝通型態居第三位，其次才是保護式。

經由理論架構，我們區分一個孩子的家庭溝通型態為共識式、保護式、多元式或放任式。究竟在四種家庭溝通型態當中，非行少年與正常的學生在個人基本資料方面有無區別？

甲、共識式的家庭：

年齡、性別：在共識式的家庭溝通型態當中，青少年的年齡有明顯的差別（ $t=5.72, P<0.001$ ），亦即非行少年組的青少年年齡較大，而正常的學生組年齡較小。在性別方面，兩組有極明顯的差異（ $\chi^2=29.079, P<0.001$ ），在教育程度方面亦然（ $\chi^2=45.77212, P<0.001$ ），這是受到隨意選擇結果的影響。

父母作風與管教態度：而在父母親的作風與管教態度方面，非行少年組與正常孩童組在母親作風、父母管教態度上沒有顯出明顯的差異。但是父親在家的作風則在兩組當中顯出明顯的差別（ $t=2.64, P<0.05$ ）。犯罪的非行少年認為父親作風相當開明。

籍貫、生長環境、家中收入等：這兩組少年在籍貫方面、生長環境、家中

排行、家中收入、家庭結構、是否住在家中、父母目前狀態、家中誰來作主、家中誰最了解與在家和誰最親近等子題當中，沒有顯出明顯的差別。可是這一組少年在宗教信仰方面顯出明顯的歧異（ $\chi^2=15.614, P<0.01$ ）。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家中子女人數與家中收入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t=0.832, t=-1.24, P>0.05$ ）。

家庭價值：這兩組對於家庭價值的看法也有明顯的差異（ $t=2.65, P<0.01$ ）。非行孩子的家庭溝通形態以共識式為主的，偏向家庭取向較重的價值觀，而正常組孩子以個人取向為重。

媒介使用：對於媒介的使用時間兩組也沒有明顯的差別（ $t=2.44, P<0.05$ ）。非行組少年偏重較強的媒介使用，而正常少年組的孩子花較少時間在媒介之上。但分別就一項一項媒介的時間使用來看，非行少年看報紙的時間較正常少年少（ $t=-2.79, P<0.01$ ）。但看電視的時間則較正常少年多（ $t=2.35, P<0.05$ ），看電影的次數，非行少年較正常少年來得少（ $t=5.62, P<0.001$ ）。看雜誌的時間較正常孩子來得長（ $t=2.44, P<0.05$ ）。看課外書籍的時間亦較正常孩子來得長（ $t=3.37, P<0.001$ ），但兩組對於收聽收音機的時間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t=1.03, P<0.05$ ）。

乙、保護式的家庭：

至於保護式的家庭溝通形態的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有什麼區別呢？其結果如下：

年齡、子女數、家庭收入等：兩組在年齡上有明顯差別（ $t=3.30, P<0.01$ ），犯罪組的少年年齡較正常組為大。但對於家中子女人數、家中收入與父母親作風及父母親的管教態度方面，非行少年組與正常少年組並沒有統計上的明顯差別。

性別、教育程度與籍貫等：兩組在性別方面有明顯的差異（ $\chi^2=17.2496, P<0.001$ ），教育方面的差別也極明顯（ $\chi^2=35.6584, P<0.001$ ）。但在籍貫、生長環境、宗教信仰、家中排行、家中收入、住家環境、家庭結構、住家與否、父母狀態、家中誰來作主、誰最了解及在家與誰最親近方面，非行組的少年與正常組的青少年都沒有明顯的差異。

家庭價值：兩組對於家庭價值的看法並無顯著的差別 ($t=0.77, P>0.05$)，也即是說在保護式的家庭溝通形態下的非行少年或正常孩子並沒有明顯地在對家庭價值方面有歧異。

媒介使用：在媒介使用方面，兩組有明顯的差別 ($t=3.63, P\leq 0.001$)。即非行少年組明顯地較正常孩童花更多時間在媒介上面。兩組在使用報紙的時間上面沒有明顯的區別 ($t=-1.47, P>0.05$)，但在看電視、聽收音機、看電影、看雜誌、看課外書方面，兩組都有明顯的差別。非行少年較正常少年花更多時間來看電視 ($t=2.25, P<0.05$)，聽更多時間的收音機 ($t=2.20, P<0.05$)，也看更多的電影 ($t=4.86, P<0.001$)，同時，非行少年花更多的時間來看雜誌 ($t=2.06, P<0.05$)，以及看更多時間的課外書籍 ($t=3.50, P\leq 0.001$)。

丙、多元式的家庭：

年齡、性別與家庭收入等：在多元式的家庭溝通形態方面，非行少年和正常少年在年齡方面有明顯差別 ($t=2.63, P<0.05$)。在性別方面，兩者有明顯的差異 ($\chi^2=7.667, P<0.01$)，教育程度亦顯出明顯差別 ($\chi^2=35.9223, P<0.001$)。在家庭收入方面，兩者也有明顯的區別 ($t=-2.50, P<0.05$)，非行少年組屬多元式家庭溝通形態者家庭收入較多元式家庭溝通組的正常孩子的家庭收入來得明顯的少。至於父母親的作風與管教態度，兩者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籍貫、宗教信仰與居住環境等：多元式家庭溝通形態的非行少年和正常少年在籍貫、生長環境、宗教信仰、家中排行、家中結構、是否居住家中、家中事情由誰作主、誰最了解和誰在家中為親最近這些子題方面，沒有顯出明顯的差別。但是，在居家環境中，非行少年組與正常少年組顯出明顯差異 ($\chi^2=11.386, P<0.05$)。非行少年住家環境分散在普通住宅區與眷村及違章建築，但正常孩子却多來自普通住宅區、高級住宅區與公教住宅。

父母關係：至於父母目前狀態，在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當中，也顯示明顯的不同 ($\chi^2=8.6138, P>0.05$)，非行少年組有將近百分之二十回答者的父母分居或離婚，但正常少年組在多元式家庭溝通形態中，沒有一個孩子的父母分居或離婚。至於家中子女人數並沒有在非行少年組與正常孩童組中顯出明顯的

差別 ($t=1.15, P>0.05$)。

家庭價值與媒介使用：兩者對於家庭價值的看法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t=1.45, P>0.05$)，但對於媒介的使用時間、次數方面，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有明顯的差別 ($t=3.55, P\leq 0.001$)。在閱讀報紙方面，正常組的孩子花較少時間看報紙，但和非行少年組沒有顯著的統計上的差異。同時，兩者對於收音機的時間，以及看雜誌的時間，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可是，在看電視、看電影、以及看課外書方面，兩者有明顯的差異。非行少年組較正常孩子花更多時間看電視、看電影及看課外書。

丁、放任式的家庭：

至於放任式的家庭溝通形態下，非行少年組與正常少年在個人基本資料方面、家庭價值觀念上以及媒介使用時間方面有無明顯的區別呢？其結果顯示：年齡、性別、教育與程度：非行少年組的孩子在年齡上明顯地較正常組的孩子來得大些 ($t=4.68, P<0.001$)。但在性別與教育程度方面，兩者均有極明顯的差別 ($\chi^2=14.2932$ & $\chi^2=38.0644, P<0.001$)。

子女數、家庭收入與父母作風等：家中孩子的人數、家中的收入與家中父母作風及管教態度，並沒有在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組中顯出明顯的差別。其他個人基本資料中，除了家中排行明顯的影響了兩組之外，其他籍貫、生長環境、宗教信仰、住家環境、家庭結構、是否住在家中、父母目前情況、家中誰來作主、誰最了解和誰最為親近這幾個子女當中，屬放任式家庭溝通形態的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並沒有明顯的差別。兩組對於在家中的排行老幾顯出統計上的差異，非行少年老居最多，但正常少年則居中佔首位，其次是老大，再次才是老么。 ($\chi^2=6.118, P<0.05$)

家庭價值與媒介使用：兩者對於家庭的價值觀念方面並沒有明顯的差別，但是對於媒介的使用則明顯的差別 ($t=3.46, P\leq 0.001$)。非行少年組和正常少年在看報紙的時間、看雜誌的時間方面沒有明顯的差別，但是兩組對於看電

視、收聽收音機、看電影、以及看課外書籍方便就有明顯的差異。非行少年花更多時間看電視 ($t=2.05, P<0.05$)，收聽收音機 ($t=2.23, P=0.05$)，看更多的電影 ($t=4.74, P<0.001$)，以及花更多的時間看課外書 ($t=2.79, P<0.007$)。

柒、摘要、討論、以及建議

一、少年的生長環境特性

從受試的二百三十八名少年的各項背景中顯示某些特性，比如其年齡以十五歲最多和十六歲居次，兩者共佔三分之二，可見當前在臺灣社會中，十五、六歲是一個危機年齡，須有適切的輔導，以減低其發展上的偏差到最低限度和增進其行為發展功能。

這些少年中以家庭子女數以四個與三個者最多，兩者共佔一半，其次為二個子女者；連帶有關係的，排行居中者最多，佔百分之四十一，而百分之三十係么子女；並且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康家庭。可見，今天在臺灣社會中，家庭子女數愈多，父母對子女的照顧與管教分身乏術之下，形成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愈大，此點與林憲（林憲，一九七八）的研究發現相似，值得有關人士注意。

有四分之三的少年居住普通住宅，且百分之九十是住在家庭中，百分之八十三少年的父母均健在；認為父母作風非常開明和相當開明的各有四分之一，共佔半數；而認為父母管教態度有點嚴厲的有四分之一的少年；以及有百分之四十的少年視母親是家庭中最親近的人。

綜合上段發現，有理由讓我們認為，臺灣社會中非行少年的父母管教因素相當重要，除其他因素未顯示其比之外，所謂非常開明和有嚴格，意味着類似放任和不够嚴格，這是變遷快速的社會中，價值標準的不定性有關。因此，今

天對父母親的親職教育之重要。

二、少年子女對「家庭價值」的看法

以十五、六歲尚未成熟的少年人，對家庭價值還是有他們的看法的。絕大多數的少年們均認為家庭應能使子女得到情愛、穩定，以及安全，家人之間應相互和自動了解和關心對方，父母對子女的愛是絕對無條件的，以及家庭中的每份子應有信念和目標。今日的社會功能雖然在改變，但家庭給予子女和家人還是一個重要的人性在親情單位，我們社會中的少年對此甚為肯定。

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少年們認為家庭對子女負絕大部分的責任，這不僅是生理和物質面，包括心理和行為面的；父母對子女要嚴格管教；以及子女要學習服從權威和尊敬長上。這些表示我們當前社會中的少年子女，有管教需求和依賴父母的，這與林清江等的研究發現類似（林清江，民國五十九年）。如何確認和適應少年的健全發展，恐是比較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另外，令吾人關切的課題之一，乃是對某些方面少年們缺乏他們的看法，約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少年們對以下九項沒有意見：要男主人或女主人或男女在家也分工，絕對服從父母抑或可表達自身的看法，以及家庭規範是絕對的抑或彈性和應變。這些觀點本身就是不應絕對性的，傳統的看法已在現代社會中受到考驗，不少少年們須受助以對此方面釋疑，始能為他們今日和明日的觀念和態度作選擇和反應。

三、少年子女對「家庭功能」的看法

絕大多數的少年（八到九成）所肯定的家庭功能有：家庭對子女的保護；家庭提供人類親情並發展社會親近感；家庭促進子女的學習動機，求進步願望，以及創造性；家庭培養子女社會整合行為；以及家庭促成子女的社會化經驗

也可說少年子女對這方面的體認和要求普遍都高。

另外，也有約三分之二的少年對下列各項表示贊同，即藉家庭人際關係經驗促成子女社會人際關係能力；家庭培養子女的性認同；以及家庭滿足個人的情感要求並發展健全人格。對本段各項尚有三分之一少年未表贊同，是否實質家庭生活並未充分獲取，或是他們從家庭以外（如學校、同儕或媒體）獲得，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有一個難以排除可能性是，家庭功能部分的問題設計之考慮欠周，所帶來的受試者應該式（should be）的答案，以致不易測出其深一層的看法。

四、少年子女對「家庭溝通」的看法

少年子女眼光中父母對他們溝通內容，以社會取向為重，尤其克制自己，寬恕他人，尊重長上，顧及和諧的社會人際關係的重要，是父母常教導他們的。因此，吾人可以說少年的父母們仍採行中國社會傳統的待人處事的道理，與子女們溝通觀念或要求他們的行為表現。但是，其實質功效如何，應該值得懷疑的，會不會由此造成青少年想的是一回事，而所做的却不一定和所想的一樣，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的。

另外，從觀念取向的各項中，也可看出當代的父母們對少年子女的自我觀念和主張還是鼓勵的，這也就是所謂較開明的一面。其中有一項少年感受到父母和他們唱反調的佔八成，這說明父母與少年子女溝通上有障礙，雖然有些情形是難以一致，但亦最好把道理說明清楚。這是，從事少年輔導工作的專業人員服務父母們，宜多注意之處。

五、非行少年背景資料的影響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某些背景因素的少年之家庭價值感較強烈，其中包括

男性少年比女性強，概由於傳統以來男人社會角色的重要性的關係；家庭收入較低的少年比高者，較強烈的家庭價值感；生長在大家庭的少年比折衷和小家庭的少年，具備強烈的社會價值感。因此，服務非行少年時對上述的差異性，宜多加考慮。

在社會取向的家庭溝通型態方面，女性少年高於男性少年，生長於市區的少年較傾向於社會取向的家庭溝通，在小家庭生長的少年較傾向於社會取向的溝通。至於觀念取向的家庭溝通較強的見諸於外省籍的少年，市區內的少年，以及家庭收入均較高的少年。類此發現也許值得研究家庭溝通方面的參考。

非行少年使用大眾媒介的傾向有以下各種情形，男少年比女少年花更多時間接納不同的媒介；長子女花較多時間在媒介上面；收入較低家庭中的少年花更多時間在媒介上。對這些發現，可供輔導非行少年時的參考，其中包括協助低收入少年選用大眾媒介以外的休閒活動，如野外身體活動等。

六、非行少年與正常少年的比較

與正常少年比較，統計結果顯示，非行少年的家庭收入顯然低於正常組的少年，故對低收入家庭的各種必要的經濟面或物質面的扶助是必須的。專業人員協助非行少年及其父母時，對收入較低家庭宜進一步查詢經濟面的事項，並善加照會或轉案。

非行少年比正常少年少看書籍雜誌，但多花費時間在多項媒介上面。因此，協助非行少年及其父母對休閒娛樂種類的選擇，是具有意義的專業服務內容。尤其，避免花時間於商業性和武打片的電視節目，是值得注重的課題。

七、正常少年中高學習成就班與低學習成就

班的比較

一、背景不同所帶來的

兩組少年在宗教信仰和子女人數兩方面，統計上顯示其差異性，低成就班中有五分之四信奉佛教和家庭中子女人數多於高成就班，與高成就班比較，總計結果也顯示，低成就班學生家庭收入偏低和住宅環境不良（其中有一成住達章建築內）。當前在都市中的國民中學，處理低成就學生行為問題時，如何考慮其社會文化層面的問題，以及運用社會資源以適應實質需求，是不可忽視的課題。可是，以當前的指導室及人員之專長，能否兼顧也是問題中的問題。因此，國中社會工作人員的設置和社會工作方案或方法之運用，乃是針對國中現呈的學生行為和適應難題和可預見此方面問題的惡化，必須深謀遠慮之事。

在媒介使用方面，經統計分析結果，低成就班學生明顯地花更多時間在媒介使用上；又在媒介項目的選用上，低成就班花更多時間看電視，而較少閱讀書報雜誌。因此，臺北市各國中低成就班學生的有計劃和整體性的輔導計劃，宜增加休閒娛樂觀念和技巧的培養，以及媒介選用準則的指導。尤其，促使低成就班個別學生能從課業以外的才藝表現中獲取成就感，也是一件值得重視的課題。

二、高成就班學生的父母和低成就班學生的父母之差異

兩組的父母在教育程度上達到統計上顯著的差異，低成就班學生的父親有一半只小學程度，母親有兩成不識字；相對的，高成就班學生的父親中四成大學以上程度，母親也有一半是高中以上程度。那麼，對於低成就班學生的輔導以防止其行為惡化，以致造成犯罪行為，其中對其父母的專業服務應如何，從上述發現中可供參考。其中對教育程度偏低的學生家長之親職教育宜與對中上階層父母應有不同。其他，對低教育程度羣的學生家長之團體討論與個別會談，亦應多加講究方法與技術。

參考文獻目錄

1. 廖榮利 1978 「對非行少年父母之專業服務：心理暨社會面的探討」，社會變遷中的青少年問題研討會論文專集（文崇一等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1979 行為發展與心理衛生——從幼到老。臺北，三民書局（代）。
- 1980 對非行少年父母之專業服務。臺北，張老師月刊——輔導研究雜誌社。
- 1980 帶領員工的藝術——領導、督導、會談。臺北，三民書局（代售）。
2. Johnson, A.M. 1968 "Sanctions for Superego Lacunae of Adolescents" in search lights for Delinquenc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1959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American Handbook of Psychiatry Vol I.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3. Liao, Lung-Li 1980 "Parents of Delinquent youth in Taipei" in the Essays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for the First Asian-Pacific Conference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Taipei: The Pacific Culture Foundation.
4. McNeil, E.B. 1969 Haman Socialization. Saint Louis: Books/Cole Publishing Co.
5. Stolz, L.M. 1967 Influence on Parent Behavior,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